

# 培养工农作家“预备队”的早期构想与实践

## ——左联时期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考察

吴述桥 戴银燕

**【摘要】**受苏俄等国“劳农通信运动”影响,左联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指示,根据自身革命动员及文艺大众化需要,推动了1930年代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左联探索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互动合作的形式,发展出工农兵通信、速写、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艺形式。但在“理论构想”与“现实实践”之间仍存在裂隙,左联积极尝试跨越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创作的差距,他们把工农通信等形式理解为作家预备军的文学修业手段,而报告文学在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历史贡献。

**【关键词】**左联;文艺大众化;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报告文学

**【作者简介】**吴述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戴银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23.11.74~8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学思想史论(1921~1949)”(项目编号:21AZD13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培育专项(重大项目培育)“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CCNU23ZZ012)的阶段性成果。

相较于延安时期的文艺通信员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联大力推动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不太为人所知。从1930年左联执委会决议提出“坚决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sup>①</sup>起,该运动便频繁见于左联相关文件和盟员讨论。这是一场由左联盟员和工农兵结合,以期实现“文艺作品通俗化”和“革命作家工农化”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它曾经被左联寄予厚望。瞿秋白说:“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刻切实的实行工农兵通信运动。”<sup>②</sup>周扬则强调“工农通信运动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sup>③</sup>。鲁迅也提醒北方左联“要努力搞工农兵的通信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者”<sup>④</sup>。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也不只是停留于口号而毫无建树,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左联的倡导和组织有着密切关系<sup>⑤</sup>,而报告文学正是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途径。<sup>⑥</sup>文学史家王瑶评说它在工人、都市店员、学生和乡村知识分子中有计划性的组织活动收到了实绩。<sup>⑦</sup>但时

移势易,这场曾受高度重视并实际推行且取得过实绩的运动现今已很少有人关注。

### 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发生

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可以追溯到苏俄“劳农通信”。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等人与岗位派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无产阶级能否建立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性及它与前代文学、与同路人文学的关系”“党对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政策”。<sup>⑧</sup>这场论战波及范围很广,苏俄主要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等都参与其中。在苏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4年5月9日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托洛茨基一方认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时期是很短的过渡时期,而这很短的过渡时期又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所以无产阶级要在它的独裁时期,创造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及文学……是不可能的”<sup>⑨</sup>。而岗位派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站在这阶级斗争的地盘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与文化是能够成立的”<sup>⑩</sup>。阿

维尔巴赫在会上更进一步提出“劳动通信”是培养无产阶级作家重要一环的观点。<sup>①</sup>无产阶级文学的拥护者们开展了广大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几千几百的作家,参加了统一团体的设置,更加密切的和大众的文学的下层(即劳动通信员)结合”<sup>②</sup>。据日本学者茂森唯士介绍:“当时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华普)考虑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逐渐地带了大众的性质,尤其是劳动通信员和农村通信员应该是看做文学的预备军队,新的工人农人作家应该从这些通信员里面产生出来,所以他们的阵线不仅伸张到熟练的作家,而且要伸张到新进作家以及文化的地正在成长的工人读者。”<sup>③</sup>苏俄“劳农通信”还影响到了日本、德国等地。

苏俄等国家“劳农通信”相关情况引起中国左翼的强烈关注,他们对国外劳农通信运动深感触动并给予了极大肯定。冯雪峰《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文艺政策》等译著较早介绍了苏联“劳农通信”的开展进程。稍后左翼刊物如《萌芽》月刊“国外文化事业研究”和“国内外文坛消息”、《文化月报》“文化情报”、《大众文艺》“各国新兴文化概况”、《文艺新闻》“国外文艺消息”等专栏均登载国外“劳农通信”消息并展开热烈讨论。瞿秋白指出,中国普罗文学运动还在幼稚期,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sup>④</sup>以群明确说:“从工农通信员里面可以培养出最有力的新作家,这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各国的新文学运动底实际,都证明了这件事情。譬如苏联近几年来新文学底伟大的发展,就从工农通信员运动上获得了无限的创造力。德国近年来新的革命文学飞跃地发展起来,主要的完全是靠许多工人通信员出身的作家。所以,工农通信员无疑地是工农作家底策源地。”<sup>⑤</sup>

左联确曾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最早在第三次盟员大会上左联即提出了要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其后左联执委会第一次将“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写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案,紧接着左翼作家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的决议案中再一次提到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在左联第四次盟员大会上更明确要“扩大工农兵通信运动,建立

农村通信机关”。此外《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等左联重要文献都有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相关指示。左联并非只是口头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还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左翼刊物上有苏俄等国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译介,刊登了左联系列讨论,也设立了一些工农通信写作专栏,如《萌芽》月刊“地方通信”、《太白》“速写”以及《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等栏目特意给工农来信提供了发表空间。夏衍、丁玲、艾芜、胡也频、吴奚如、周文等人都参与过发展工人通信员的实践,发现和培养了高而、匡庐、白苇、周白月、吴保太、戴叔周等一批工农兵作者,还创作了一些速写和报告文学作品。

左联推动工农兵通信运动有几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萧三在介绍1930年哈尔可夫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时大篇幅介绍了各支部工农通信员良好发展态势,他提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是再次确定普罗文艺发展路线,既反对否定无产阶级文艺存在和认为同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文艺唯一创造者的右倾观点,也批评认为只有工人通信员是无产阶级文艺源泉的“左”倾观点,他认为如果各国都努力发展工人通信员运动,那么无产阶级文艺的创造就大有希望。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萧三传达给左联的讯息显然是要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sup>⑥</sup>

其次,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还是革命动员需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除了发动军事斗争,也强调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注意发动和联络一切可能反对和批判国民政府的因素,包括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文化领域。”<sup>⑦</sup>文委书记潘汉年指出,在阶级矛盾激烈的形势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应当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和鼓动的武器之任务”<sup>⑧</sup>。潘汉年不仅提倡作者本人要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去获取无产阶级经验,还强调应该争取和鼓动工农大众中的识字分子,要“尽量征求大众——被压迫的工农斗争生活的记录,不管通信,随笔,日记,并且一定要特别注意识字的工农的通信”<sup>⑨</sup>。

另外,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更被视为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基本途径之一。1930年左联执委会决议案指出:“在阶级对立越发明显的时代,需要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为苏维埃政权斗争,需要去汇合一切革命的感情来充实革命的发展。”<sup>①</sup>左联号召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去了解组织地下层的感情,并将其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解放斗争中来,以达到文学“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所有”和“改变作家生活,让作品内容充满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目标。<sup>②</sup>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作为实现“文学为大众所有”的一种具体实践途径被提出。左翼理论家认为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恰好可以实现“知识分子走向大众”和“在工农中培养自己的作家”两条道路的结合。通过开展这一运动,其他如作家的生活问题,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问题,作品之内容与形式问题,会顺利地得到解决。这一运动“不但促进我们的作家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决心”,而且还“能够从封锁了的地下层培养工人农民的作家”,在左翼理论家看来“工农通信员是新的工农作家之预备队”。<sup>③</sup>《文艺新闻》编辑部明确提出,“大众化将是一切文化上的活动中心”,而“工农通信工作将为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艺产生最正确的而真实的基础之一”。<sup>④</sup>

## 二、“书斋”和“地下层”的“通信”联动

鲁迅曾高度评价高尔基的一篇报告文学,认为它“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他还指出在中国的工农中想要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作者,一时恐怕是困难的,而像这样出身于底层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可以作为“中国工农”阅读的“范本”。<sup>⑤</sup>从中可见鲁迅对工农作者的希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正是要让作家走出书斋,深入工厂、农村、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培养工农通信员,像门头沟矿山、开滦矿、天津和唐山的一些工厂都发展有工人通信员。<sup>⑥</sup>左联培养工农通信员的路径大体可以归为三个环节。第一是借助工人夜校力量培养和发现工农写作者,如杨树浦工人区的涟文小学、惠知完全小学、虹口区唐山路半江小学以及辣斐德路附近美德小学,都是白天教

孩子,晚上给工人补习。第二是左联作家修改工农稿件。艾芜、甘迺、周文、周钢鸣、何家槐等人都曾参与这项工作,倘若遇到一些不错的作品,左联作家便帮忙指导修改并介绍到刊物上去发表。第三是报纸杂志推介。为了能让大家注意到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工农稿件,左联作家还会在报纸杂志上进行推介。

左联创办工人夜校当然并非只为培养工农通信员,但工农通信工作赋予了工人夜校新的使命,即让工农掌握识文断字能力,从中发展一些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工农作者。据丁玲回忆:“为了开展工人通信运动,在工人中搞大众文艺,左联办了工人夜校,艾芜同志就去教过书。”<sup>⑦</sup>在王尧山印象中,周文曾主动向他了解过在上海当学徒的生活情况以及工厂的罢工斗争,并且鼓励他把经过写成报告文学。<sup>⑧</sup>左联在多个工人区办有工人夜校,派作家去当教员,教文化,甚至教创作。像高而<sup>⑨</sup>、吴保太<sup>⑩</sup>、周白月<sup>⑪</sup>、高树颐<sup>⑫</sup>、魏辛<sup>⑬</sup>等工农都在左联帮助下开始尝试创作。这种方式拉近了左联与工农兵的距离,让左联作家收获了工农的赞许。一位热水瓶工厂的工人就在悼念周钢鸣的文章中写道:“他一听说我是个工人,还有一些工人朋友,很高兴,对我很热情。不久他就常到我家里来玩,开始介绍一些书给我看……我文化不高,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他,他耐心地给我解答。”<sup>⑭</sup>左联让全体盟员到地下层中去的号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虽然工人夜校条件艰苦,但左联作家却借着这一运动深入工农生活中了。难怪夏衍曾评价说,“左联乃至文委,真正和工人运动发生直接联系,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sup>⑮</sup>。

左联作家和工农作者发生“通信”联动,开启了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周扬曾提出“工农通信员必须运用各种小的形式,如简短的报告,sketch,煽动诗,墙头小说等形式”<sup>⑯</sup>,但目前尚没看到“煽动诗”的实际创作,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应当是主要发展了工农通信、报告文学、sketch(速写)和墙头小说这四种既相关又有所不同的文艺形式。

首先是工农通信。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地方通信栏目刊载了工人通信《我们的生活》。这篇通信从女工视角细致入微地揭露了工厂里从工头到资本家的多重压榨,由内而外地剖析了工人的痛苦

与挣扎。此外,阿龙头<sup>⑧</sup>《工厂通信》、戴叔周<sup>⑨</sup>《前线通信》、苍剑<sup>⑩</sup>《矿工手记》等通信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在工厂、农村及军营遭受的压迫和痛苦,汇集着底层最真实的声音。而当痛苦汇聚到一定程度,便凝结成强烈控诉:“资本家简直是喝我们工人血汗过活的魔鬼呵!”<sup>⑪</sup>“这付汗洗黑了的的面皮,这双铁石磨粗了老虎钳似的手,对着什么人也不惭愧,握着什么东西也是应当。”<sup>⑫</sup>这些“心声”传递着血脉偾张的革命情绪,是每篇工农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元素。这种形式由“工农兵”写,又由感同身受的“工农兵”读,直接沟通传递了工农兵的革命情绪,能让工农兵产生共情进而投身革命斗争,因而能够发挥“鼓动”和“组织”工农的作用。

除工农兵通信外,报告文学也是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重要文艺形式。和工农通信以工农作者为主不同,报告文学实际以左联作家的创作更具代表性。夏衍是1930年代报告文学代表作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1931年10月23日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发表《劳勃生路》,这是夏衍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他对左联号召全体盟员“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一种响应。创作《包身工》期间,夏衍亲自到包身工住宿工房考察了足足两个多月,每天半夜三点多起身走十几里路赶到杨树浦,深入调查工人的工作生活,搜集真实细节,刻画了让人动容的“芦柴棒”形象。其他左联作家如楼适夷也积极响应工农兵通信运动,翻译和创作过许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上海抗战期间,楼适夷在闸北前线住了一个多月,创作出反映十九路军爱国将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报告文学作品《战地的一日》。《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sup>⑬</sup>《上海的烽火》<sup>⑭</sup>这两部报告文学集当中许多作品都是楼适夷等人亲自上火线,从战壕中得来的珍贵记录。

此外,“速写”也在《北斗》《正路》这两个左联机关刊物及其他左翼文学杂志上频繁现身。“速写”原义为概略、草图,美术领域指初步的绘画草稿,后来这个词被文学领域借用,逐渐发展成一种简洁、通俗的具有纪实性和故事性的小文章。俄苏的速写作者包括工农通信员和作家:“不仅是工人通信员利用之

以描写他们在工厂中、矿穴中,或农村中的生活,而且这种速写的形式常被著名的苏联作家运用,以描写他们所访问的特殊工业之每分钟的琐碎。”<sup>⑮</sup>中国的情况也十分相似。杨潮《包饭作》从“我”的主观感受起笔,由“黑暗而陡得可怕的楼梯”到女孩子们的卧室,迅速地将这些女孩的非人生活客观勾勒出来。与此类似,织云《纱厂巡礼》由“一块又黑又大的黑棉帘子”带出被机器折磨的女工,反映工厂女工的悲惨境遇。周钢鸣《疲劳的夜》写尽了手艺人的勤劳朴实与痛苦挣扎。工厂技工高而的《小张》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辛酸的底层工人形象。农民周白月的《姐姐》描写了一个为了收成哪怕病重还要坚持下田干活儿的姐姐。还有周文的《茶包》、吴奚如的《他乡遇故亲》、何家槐的《哑吧子》等速写作品篇幅短小,不约而同地截取地下层的苦难生活,以客观描绘的手法再现真实场景,从而产生撼动人心的效果。

最后,墙头小说也被作为培养工农兵通信员的一种途径加以提倡。<sup>⑯</sup>金丁曾回忆说:“左联提倡过写墙头小说,它要求写的短而通俗,便于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看完。我曾练习写过,但很不易写。我觉得不只是个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了解工人喜欢看些什么内容。”<sup>⑰</sup>墙头小说最初从日本传来,《文艺新闻》特意开设“墙头小说”栏目,作品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翻译国外墙头小说,二是工农和左联作家的创作。该栏目征稿启事说明:“本号起本刊每期刊载墙头小说一小篇,以一千五百字为限,由适夷主编,请读者投稿。”<sup>⑱</sup>其发表的第一篇墙头小说是日本作家窪川稻子的《千人针》,小说从一群工厂女工的闲谈起笔,通过对话展现了一个从懵懂到觉醒的工厂女工形象。该小说仅一千多字,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参考。工人白苇<sup>⑲</sup>在墙头小说的写作上较有成绩,其《火线上》《墙头三部曲》《游戏》《夫妇》等写得简短而通俗,以具体的事实描写鼓舞读者。有研究者评价其作品《游戏》:“人物不多,对话却极富童趣,能比较集中地表现孩子的纯真与活泼,既有鲜明的思想意义,且有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乐趣,确是一篇寓教于乐的好作品。”<sup>⑳</sup>当时郑伯奇也创作了不少“墙头小说”,后集成《墙头小说集》<sup>㉑</sup>。左翼作家巴夫在左翼盟员何家槐、周钢鸣等人的帮助下学习墙头小说写

作,其《情形小说》<sup>⑤</sup>一书中收录了十二篇墙头小说。这些墙头小说虽较少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但却是左联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重要尝试,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 三、报告文学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出路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到,左联作家与工农作者主要以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速写、墙头小说这四种文艺形式呈现地下层生活。但后来学界却常常直接将“报告文学”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进行组合,相对“简化”了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史实。<sup>⑥</sup>这与中国报告文学的起源存在不同解释有关<sup>⑦</sup>,也与中国报告文学形成理论自觉时期的文体认知差异存在一定关系:“从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就存在着分歧或不足,其集中点是这种文体的属性……”<sup>⑧</sup>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繁荣得益于国际报告文学理论的引入<sup>⑨</sup>,其实翻译过来的主要是俄苏和日本等国家的左翼论述。在报告文学概念被明确固定下来前,这些国家本身还存在相关不同指称,如“通信文”“报告文”或“速写”(sketch)等名称在日本曾被穿插使用。<sup>⑩</sup>中国左翼理论家几乎同时接受了这些不同外来名词,甚至将墙头小说也和报告文学并列,如冯雪峰认为“报告文学,墙头小说,大众朗诵诗等等。这些形式,都是真的从劳动大众中产生,从萌芽而成长为普罗艺术的新的形式的”<sup>⑪</sup>。报告文学史将不同概念和指称都“简化”为报告文学,可能是因为历史叙述不能事无巨细,而对这些不同概念和指称而言,要做到不被“简化”,就应当在文体的竞争当中具有更大优势。

“报告文学”的确比“速写”“墙头小说”等更具有包容性。“sketch”原为法文,是探访、报告之意,1930年代将其翻译为“速写”。这个概念在报告文学盛行前就已出现,从它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大多数就是在报告。茅盾在读了若干国外输入的报告文学后认为,报告文学形式范围宽阔,sketch则是其中之一。<sup>⑫</sup>周钢鸣则认为“报告文学好比一整部的电影片子,而速写不过是这整部片子里的一片或数片”<sup>⑬</sup>。夏征农指出“报告文学,固然不外是速写的另一种形式”<sup>⑭</sup>,认为报告文学是从速写这种文体中脱胎而出的。三位作家观点虽然并不一致,但都明确速写可以被包容进报告文学。相比之下墙头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

关系较为隐晦。墙头小说最早由日本左翼机关刊物《战旗》杂志发起,以群很清楚“真正的墙头小说,必须以特定的场所为目标,可以在壁报上掲載,或单独黏贴在墙头上”<sup>⑮</sup>,但它并没有真正在“墙头”开展起来<sup>⑯</sup>。不过以群还是对墙头小说的严格定义做了些许改动<sup>⑰</sup>,为他将墙头小说纳入报告文学做了必要理论铺垫:“报告文学也称作记录文学或通信文学。凡是反映直接的事实的,如小小说,墙头小说之类,都可以加入报告文学的范围内。”<sup>⑱</sup>

报告文学能够“整合”其他形式,还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艺术困境有关。左联作家与工农作者都有不少创作,但倘若将二者的创作分开,我们会发现工农作者在运动中的声音更像是“低声呢喃”,他们的创作较为艰难,整体缺乏影响力,相较而言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成就更高,这一事实揭示出左联“理论构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裂隙。虽然左联希望大众能够自主言说,但当时工农兵文化程度不高、艺术修养不够等问题非常现实,工农兵暂时还无法做到表达自如。左联也积极尝试去跨越二者间的鸿沟,想要解决如何提高的问题。丁玲发表在《北斗》上的一篇回复工人的《代邮》表明了左联的态度:“你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毛病,句子的不干净,支配材料也不十分适当,不过大体是很好的,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是极少见的……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很希望你更努力下去,如若你有其他稿子,都可以寄来,我一定为你看,或许还要为你修改一点的。”<sup>⑲</sup>丁玲言辞恳切地指出工人阿涛文章的优缺点并询问阿涛意见,以期在互动中提高工人的艺术水平。为了保证这种“互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萌芽月刊》还专设“地方通信栏”用以刊载地下层通信,《文学月报》则主动提拔、培养工农革命作家,声明“每期将登载至少一篇工人通信员的作品”<sup>⑳</sup>。

但这种将工人通信朝文艺方向修改的办法见效相对较慢,于是出现了一种将“通信”等视为“报告文学”练习期,认为他们可以发展到“报告文学”的表述,既承认艺术差距,也再度确认了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未来可期。左联作家不是不知道艺术水平高低,只是他们对成绩的渴望显得有些迫切,就像瞿秋白所说,“难道所有那些通信,报告,工人作家的‘处女

作’等等,都是杰出的作品吗?当然不是。而大家仍旧把这些东西叫做‘文艺’”<sup>⑥</sup>。左联机关报《前哨》以“报告”涵盖“地下层通信”,相对模糊地处理了不同说法:“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同志们,快送你们的报告来!!!”<sup>⑦</sup>还有部分理论家将工农写作划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工农通信等形式和报告文学以“艺术”高低相区分,报告文学开始成为通信等形式的“高级阶段”。正如以群所说:“当我们讨论到报告文学的时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当作家预备军的文学修业手段,文艺创作的初步阶段的报告文学;其次,是作为文学之一样式的报告文学。”<sup>⑧</sup>《红色中华》征文稿当中提出希望同志们能更踊跃地把自己的斗争生活做成通信文字寄来发表,并直言“我们就是这样来创造中国大众文艺的报告文学”<sup>⑨</sup>。周扬对这一表述表示乐观:“工农通信员的活动是和重大的政治的任务相联系的。这些任务不一定带着文学的性质,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创造力,经过工农通信这个练习时期之后,是会达到文学的领域的。”<sup>⑩</sup>

实践也证明报告文学相较其他形式而言,在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茅盾曾批评过左联时期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无视小资产阶级出身作家,把“组织基础的中心”移到工农身上,在组织上打上了狭窄的观念。<sup>⑪</sup>左联的实践与理论预期确实存在出入,其实际推行情况和“革命作家工农化”的预期仍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左联在报告文学方面对此的探索。1933年阿英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这两部报告文学集以编书的形式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组织”。为鼓动更多工农写作,左联将“编书”形式进一步扩展为“征稿”。上海文学社《中国的一日》征稿让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参与创作,掀起了集体创作热潮,开启了“征稿”组织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尝试。此外,通过多人提供材料的集体创作方式也被探索了出来,如《包身工》的创作离不开许多人提供的意见和实际材料,这种调查的过程也可说是集体创作的过程。<sup>⑫</sup>就像以群所说:“报告文学有效地与‘工农兵通信运动’相结合,使得

它的作者范围及于专门文艺工作者以外的都市店员、工人、学生、及种种薪金劳动者,乃至一部分乡村知识分子。”<sup>⑬</sup>通过口述材料或书面材料,工农兵作者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作品也便成了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集体创作的形式或许给工农写作带来“真实性”的疑虑,但左翼方面充分肯定其是“同社会变革的集团运动实践相配合的文学活动”,认为它有利于广大的工农文学通信员作家的成长,可以“从这一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技术的锻炼”。<sup>⑭</sup>

### 结语

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贯穿了整个左联时期,是左翼探索培养无产阶级文学者、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实践。左翼高度重视工农兵通信运动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忽略了最实的推动工农通信工作的‘文化大众化’的广泛运动,则工农通信工作将同文化大众化工作一起走到闭塞而停滞的危险中”<sup>⑮</sup>。他们甚至将其任务扩展到了许多大众团体中去,如袁殊谈及工厂通信员活动范围时指出:“在大众的团体,譬如工会,农民协会,合作社,工人夜校,读书班,工会的游艺股等等,都等待着我们的活动。”<sup>⑯</sup>但也毋庸讳言,左联时期工农兵通信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想那般亮眼的成绩。个中原因或许较为复杂,大体来说和政治斗争紧张激烈、工农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等均有一定关系。尽管如此,左联积极推动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互动合作,初步探索了二者结合和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现实路径,为延安时期文艺通信员运动积累了前期经验。与此同时,左联为工农通信等形式寻求艺术性的出路,不论是出于策略亦或是无心插柳,最终成就了报告文学,为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 注释:

①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8月第1卷第1期。

②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4月第1卷第1期。

③周起应(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1932年7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④陈漱渝：《关于北方“左联”的珍贵史料——略谈陈沂致我的一封书简》，《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第6期。

⑤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⑥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决议指出应该坚决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工作：“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见《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8月第1卷第1期。

⑦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⑧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⑨⑩冯雪峰：《新俄的文艺政策》，《冯雪峰全集》第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303页。

⑪冯雪峰：《新俄的文艺政策》，《冯雪峰全集》第10册，第329页。

⑫柯棣：《新兴文学论》，沈端先译，南强书局1930年版，第60页。

⑬茂森唯士：《俄国：革命十二年间之苏俄文学》，沈端先译，《大众文艺》1930年3月第2卷第3期。

⑭瞿秋白：《斯大林和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⑮华蒂(以群)：《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文艺创作概论》，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24~25页。

⑯萧三：《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文学导报》1931年8月第1卷第3期。

⑰杨胜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⑱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拓荒者》1930年3月第1卷第3期。

⑲潘汉年：《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大众文艺》1930年5月第2卷第4期。

⑳㉑㉒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第1卷第1期。

㉓《文艺新闻》编辑部：《大众化问题发端》，《文艺新闻》1932年5月第53期。

㉔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㉕陈北鸥：《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页。

㉖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全集》第10集，张

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㉗王尧山：《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㉘据吴奚如回忆，高而是一名制版技工，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爱读鲁迅杂文。在左翼文艺界倡导的大众语运动中，他以工人作者身份，在《中华日报·动向》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用拉丁化上海方言，写过几篇作品。参见《吴奚如回忆“左联”大众委员会的活动》，《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文振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页。1934年高而在《动向》副刊上共发表9篇作品，分别是：《大众语与大众》(7月8日)、《我们的话》(7月10日)、《大众讨论大众语的纪录》(7月17日)、《一封上海话的信》(8月16日)、《四月初五个一吃官司格人个日记》(8月19日)、《永远被人瞧不起的》(9月4日)、《大众语与大众语论战者》(9月25日)、《母女的话(上)》(9月27日)、《母女的话(下)》(9月28日)。

㉙吴保太是制版厂学徒工，常以自己的生活感受写些短篇文学习作，曾在专供各厂文艺小组阅读的小型刊物《大众文艺》上发表作品，解放后担任工厂厂长。参见《吴奚如回忆“左联”大众委员会的活动》，《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401页；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等情形》，《左联回忆录》上，第225~238页。

㉚农民周白月在左联培养下曾发表《姐姐》《田头乡邻》《为难的事情》等作品。他后来成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发表通讯《在新四军中》、散文《拾烂的锦堂叔》《活》等。

㉛高树颐，湖北汉阳人，是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司的电车工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解放后当了中央农垦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参见《吴奚如回忆“左联”大众委员会的活动》，《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402~403页。

㉜据艾芜回忆：魏辛是工厂做杂工的，常以“雪苇”这个笔名写作。参见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等情形》，《左联回忆录》上，第225~238页。

㉝齐速：《非左联作家的盟员》，《终身难忘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㉞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1页。

㉟周起应：《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1932年7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㊱阿龙头是电力工厂工人，他在《大众文艺》上发表过《工厂通信》《电力工人的斗争经过》两篇通信。通信揭示出左联工农通信运动开展的大体机制，即工农(写通信)与左联作家(修改通信)的互动过程。参见丁程辉《试论报告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㊲戴叔周是辗转于抗日战场的炮兵，其《前线通信》记录

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士兵进退两难的处境。

③苍剑是来自农村的煤矿工人,其《矿工手记》三期连载于《文艺新闻》的“地下层通讯”专栏。

④阿毛:《我们的生活》,《萌芽月刊》1930年5月第1卷第5期。

⑤阿龙头:《工厂通信》,《大众文艺》1930年5月第2卷第4期。

⑥南强编辑部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南强书局1932年版。

⑦《文艺新闻》编辑部编:《上海的烽火》,文艺新闻社1932年版。

⑧雷丹林:《苏联文学通信》,《文艺新闻》1932年4月11日第50期。

⑨徐迺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1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页。

⑩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左联回忆录》上,第194页。

⑪“每日笔记”栏目,《文艺新闻》1932年3月28日第48期。

⑫白苇,浙江人,又名韩伯涛(左联时期用名),又名白弢、韩进,笔名白苇、白韦。1926年参军到广东,以小兵身份参加北伐至南京。1929年在上海和兴钢铁厂当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活动。1931年在浦东丰塘瓷厂做工。在冯雪峰、楼建南帮助下陆续写了一些通讯和墙头小说,如《工厂通讯》《火线上》《在厂门口》《传单》《早饭》《传令的人》《游戏》等,被认为是“左联通讯员运动中涌现的战士文学青年”。后到瑞金苏区中央《红色中华》报当编辑,1937年间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晋冀鲁豫北方局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参见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73页;唐鸿棣《论“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左联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支援“一·二八”抗战等回忆》,《“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⑬张之伟:《左联十年的儿童散文小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

⑭郑伯奇:《墙头小说集》,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

⑮巴夫:《情形小说》,天马书店1935年版。

⑯丁晓原认为:“‘左联’大力倡导报告文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将其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学样式,左翼推进文艺大众化,形成大众文艺的一种具体运作措施,并将其纳入‘工农兵通信运动’。”参见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再如左文、毕艳认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其实也可以表述为工农兵报告文学运

动。”参见左文、毕艳《左联期刊与报告文学的“联姻”》,《中国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4期。

⑰⑱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和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0页。

⑲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第54页。

⑳白春燕:《文艺的轻骑队:杨逵报告文学思想与理论探源》,孟庆枢主编:《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483页。

㉑洛扬(冯雪峰):《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2年4月第1卷第1期。

㉒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937年2月第1卷第11期。

㉓周钢鸣:《怎样写报告文学》,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51页。

㉔夏征农:《论小品文——答姜潇君》,《征农文艺散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㉕②③华蒂:《文艺作品的新形式》,《文艺创作概论》,第108、108~109页。

㉖④孙犁:《关于墙头小说》,《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㉗阮芸妍:《“左联”时期的“墙头小说”——以楼适夷、叶以群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㉘丁玲:《代邮》,《北斗》1932年7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㉙编者:《编辑后记》,《文学月报》1932年12月第1卷第5、6期合刊。

㉚⑤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4月第1卷第1期。

㉛⑥《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文化斗争》1930年8月第1卷第2期。

㉜⑦华蒂:《文艺作品的新形式》,《文艺创作概论》,第109页。

㉝⑧编者:《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红色中华》1933年4月2日第62期。

㉞⑨周起应(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1932年7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㉟⑩茅盾:《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㊱⑪编者:《提倡集体创作的意义——答李健文陈志敏》,《读书生活》1936年10月第4卷第12期。

㊲⑫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王荣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9页。

㊳⑬编者:《提倡集体创作的意义——答李健文陈志敏》,《读书生活》1936年10月第4卷第12期。

㊴⑭文艺新闻编辑部:《大众化问题发端》,《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第53期。

㊵⑮袁殊:《关于工厂通信的任务和内容》,《文艺新闻》1932年5月23日第56期。